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

〔日〕增渊龙夫 著

吕静 译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

〔日〕增渊龙夫 著 吕静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 / (日) 增渊龙夫著; 吕静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9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

ISBN 978-7-5325-8503-8

I. ①中… II. ①增… ②吕…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 IV.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8483 号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

[日] 增渊龙夫 著

吕 静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9 插页 5 字数 417,000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978-7-5325-8503-8

K · 2342 定价: 8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夫马进 古贺登 谷川道雄

尾形勇 岸本美绪 森正夫

策划

李济沧 蒋维崧

日本创价大学日中友好学术研究资助计划出版资助

SHINPAN, CHUGOKU KODAI NO SHAKAI TO KOKKA

by Tatsuo Masubuchi

© 1996 by Setsuko Masubuchi

First edition 1960. New edition 1996

New edi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1996.

Thi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year of publication

by th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opyright holde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总序

谷川道雄

2004年10月下旬我首次访问上海古籍出版社时,有幸会晤了王兴康社长、赵昌平总编、蒋维崧编审以及其他诸位先生。当时我是应华东师范大学牟发松教授的邀请,在该校逗留两周并进行授课和演讲的。因为那时正值拙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的中译本(李济沧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才有了拜访该出版社的机缘。“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这一颇具规模的出版计划,正是由于那天的会谈而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我是在那年7月从承担拙著编审的蒋维崧先生的信中得知这一出版计划的。信中提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意以拙著的出版为契机,进一步拓展范围,更广泛地向中国学界介绍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成果,并希望我推荐一批能够代表日本研究水准的著作,尤其是能够选择那些在开阔视野下关注社会与人文,或运用新的方法和理论并在实证研究中取得成果的著作。在10月的会谈中,出版社又出于同样的旨趣,要求我予以全面的合作。

想来这的确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计划。有关中国史研究的中日两国学界交流,已经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正呈现出日益兴旺的趋势。交流不仅限于人员的交往,还以相互之间论文、著作翻译的形式对双方发生着影响。但是,这还只不过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已,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即便那些在日本学界具有长久影响力的名著,几乎都没有中译本的出版。所以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这一计划,不能不说是打破现状、开创新局面的创举。就我个人而言,拙著中译本的刊行能够成为促成这一趋势的契机,更是倍感欣悦。出于如此的考虑,我也就不揣自陋地应允出版社,愿竭全

力协助此项计划的实施。

回到日本以后,我立即着手选定书目,其间还听取了我的同行、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森正夫先生的意见,最终向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交了我的选目方案。经与出版社协商,决定首批出版十种左右。

非常巧的是,这里所选的学术著作,正好反映了近代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按照我个人的看法,这一过程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1868—1912)初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近代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形成期。当时,虽然兰克(L. Ranke)的弟子李司(L. Riess)受聘于东京大学讲授历史学,传授实证主义方法,但那毕竟是以欧洲史为基础的史学。在日本学者之中当时出现了与欧洲史亦即西洋史相对应,设立东洋史(即亚州史)分野的举措,由此形成了以中国史为中心的东洋史,并且延续至今。这一情况一方面表明由于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出现了必须重新认识东亚各国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日本汉学素养的基础之上,已经出现了将中国作为近代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学问。最能够代表这一时期中国史研究,而且影响至今的学者,即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1866—1934)。他所主张的“唐宋变革”论,在这一阶段正在孕育成形。众所周知,他的这一观点是切合中国社会实态的,是对中国史发展所进行的逻辑性解释。作为本丛书之一的《中国史学史》,就是出自他对中国传统学问的广博知识以及对历史发展透彻逻辑分析的力著。

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第二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即所谓的“战间期”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有着密切注重社会与民众的特点,中国史研究亦不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波及全世界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潮流,也影响着日本的历史学界,作为具体的表现则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盛。而且,其中有着马克思主义直接、间接的影响是不可否定的。在我的先师、前辈的学者之中,有许多就是在这一时代新史学潮流中奠定了自身研究基础的,本丛书的大部分作者都是属于这一辈的人物。

然而,作为上述新倾向顶点的20世纪30年代,又正是军国主义猖獗的时期。当时,不但不可能进行自由的研究,军国主义国家还以各种形

式要求中国史研究者战争提供合作。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那一严冬似的时代终告完结。由此也开始了中国史研究的第三阶段。

“二战”以后的日本中国史研究课题,是如何将中国史作为发展的中国史进行重建的问题。即必须纠正被军国主义歪曲了的中国史观,按照世界史普遍逻辑对中国史作出理解。当时对此起到重大作用的,是从战时思想统治中解放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按照生产方式发展规律将中国史系统化的尝试亦由此开始。为此日本学界曾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参加讨论的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学者。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以生产方式为依据的唯物史观的发展规律是否适用于中国史的问题;另一个焦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构想的中国史时代分期观点是否正确的问题。围绕这两个问题,从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有着长期、激烈的讨论,而且主要都是基于史料的实证观点之间的相互争论。其中虽说也有不够成熟的地方,但是毕竟应该说战后的中国史研究在当时有着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

参加讨论的既有在上述第二阶段业有成绩的学者,也有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研究者。本丛书著者中,除了内藤湖南之外,都是为战后中国史研究做出了贡献的人物。

我在选择这套丛书的收录著作时,并没有意识到上述的历史过程。然而,卓越的作品必定会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时代的代表性,所以很难说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现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与战后那二十几年相比已经有了相当的变化。尽管如此,这些先学的著作在今天仍然保持着长久的生命力,从而不断启发着后生学者。

作为日本人,中国史既是一种外国史,又不是单纯的外国史。两千年来,熏染了日本文化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历史发展的产物。过去的日本在向中国的不断学习之中发展着自己,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可以说也是由过去形成了结构,至今仍在其延长线上运行的。因此,我们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有着特别的亲近感,即尽管是外国史,但又有一半好像是在研究自己国家历史的感觉,我们一直就是这样看待中国史的。其理由之一,也许就在于日本文化是在汉字文化

圈中培育成长形成的吧。无论如何,当这种感情作为近代历史学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方法和实证的结果,而将中国史总体按照世界史的普遍观点予以体系化是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终极目标。

总之,也许可以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是由传统与近代、日本与中国乃至世界这样综合的视野重合展开形成的。当然,这种特点亦有其利弊两端。不过,本丛书所收著作都是肩负重任、不倦攀登的卓越成果。我坚信本丛书对今后日本中国史研究之国际交流的发展必将有着巨大的贡献,并对将此计划付诸实现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马彪译)

序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的历史学界有三本惊世之作相继登场,那就是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以及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时人都惊呼也许这以后将再也没有新见解的出现了。虽然这是一种杞忧,但是这以后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确实受到他们极大的影响。

西嶋定生有很多著作,他屡次将日中两国历史发展中的差别进行比较。在前田直典《东亚古代的终末》一书的深刻影响下,西嶋阐述了中国文化的先进性。中国首先在东亚地区取得了一个个阶段性的历史发展,而其周边国家则追踪并体验一个个历史阶段。西嶋定生曾经考察日本引入汉字一事在日本历史文化发展上的影响。在日本走向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究竟是如何引入汉字的?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所谓“传播”一词,不能过于简单草率地解释了事。“文化”从先进地区传播到落后地区时,并非在所有的落后地区都有期待性的发展。落后地区若没有痛感向先进地区学习的必要性,是决不会开始学习的。因此,那个先进地区首先必须具备吸引落后地区自发关注及兴趣的优势。

西嶋定生发明了“册封体制”之词,表示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册封”本身是后世的用语,即中国皇帝册封外国君主。外国在刚开始接受册封的时候,并不一定了解册封的真正含意,随着册封的不断进行,日本方面渐渐认识到了解汉语、汉字的必要性。自此才开始学习汉语、汉字。西嶋定生认为,如果没有东亚册封体制这个外交形式,日本不会引入汉字文化。

木村正雄研究历史地理。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将西周以来的诸侯国灭

国并设置为县。根据《孟子》所谓“大国、次国、小国”的说法,可知当时的县规模较大。此后县的数量渐渐增加,其规模也越来越小。汉代《礼记》将《孟子》“大国、次国、小国”的说法作为汉代的常用语。春秋战国时期铁器普及,区划耕地急速增加。在这种状况下增加的县,实际上是在新区划的土地上经营的新县。与此相反,灭亡诸侯国后所设置的县则是过去的、用新的方法经营土地的旧县。

增渊龙夫考察春秋时期诸侯国所改变而来的县,指出这些县所具有的强烈的反中央性,这一特征源自西周以来社会的基层结构。他使用“任侠性习俗”这一词语。该词来源于史书中的“游侠”。宫崎市定曾用游侠论来解释他的城市国家论。宫崎所关注的阶段就是以东汉王朝为中心的时期,研究“游侠的儒化”问题。而增渊在此基础上,对战国以来的王制、皇帝制及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

增渊龙夫与西嶋定生一样,始终关注战国王权、皇帝权力之中的“公”与“私”的问题。他将山林薮泽视为私权的源泉,与郡县制的人头税作出区别。他引用《盐铁论》以山林薮泽为霸王之资,讨论战国王权的“家产化”问题。

在今后,我们还将继续研讨三位大师的经典研究,他们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松丸道雄的《商王田猎地论》,在这里允许我赘言数语。

在中国史上,我们讨论到领域论问题时有如下用词:一个是大领域,一个是中领域,另一个是小领域。秦始皇统一的天下是大领域,战国各国领有的是中领域,西周春秋以来诸侯国控制的则是小领域。一直以来学者利用甲骨文的商王田猎记事史料,推定商代的田猎地存在于一个比较广大的领域之内。但是松丸道雄以数学背理法证明了商王的田猎地仅在半径二十公里以内的范围中,这就是小领域。在田猎地中有商王支配下的部族名,松丸道雄推定这是商王通过田猎仪式的举行,在精神上向各部族施加一种威压的表现。以笔者的鄙见,这些商王的田猎地就是王都近傍设置的“汤沐之邑”。所谓汤沐之邑是在《公羊传》等书中常常使用的古典用语。他们讨论将泰山近傍郑国之邑,去交换处于中原之地的鲁国的许田。《公

羊传》曰“诸侯皆有汤沐之邑”。《公羊传》等书籍所要讨论的是经学上关于交换土地问题的是是非非,在此要讨论的是“诸侯皆有汤沐之邑”。凡诸侯到王都,途中在汤沐之邑滞留,取得生活必须的物品。这是从己国到王都的旅途中可以利用的邑。“汤沐之邑”就是王朝与诸侯们维持政治关系、即是邑制国家的基础。

增渊龙夫认为商王田猎地存在于比较广大的范围内,那与他想定的战国王权的“家产化”似乎没有差异。而事实上商王田猎地仅存在于小的领域之内,与战国王权的“家产化”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这就是领域国家与城市国家之间的本质性区别。

上述仅仅是在枝末细节上的心得而已,不是对增渊史学先进性和系统性的评论。

吕静女士在其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路途之中,利用和检讨上述学者们的意见,对于增渊史学的本质性和特异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吕静女士在东京大学研究中国古代史,其关注的领域和视野扩大到日本过去的中国研究者身上,拥有极其难能可贵的判断力和鉴赏力。

在此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之际,附以如上赘言,提到一些通常不被关注的事情。

平势隆郎

增渊龙夫氏与我^①

以执笔撰写《一九五四年度历史学年报·历史学的成果与课题VI》(历史学研究会编)东洋古代部分为契机,引发了我对秦汉及以前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兴趣。这个时期正是我的《论语》研究江郎才尽之时,于是我考虑尝试从不同于《论语》角度的《左传》作为研究对象,我的这种思考萌芽,正是产生于这一时期。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开始关注增渊龙夫氏的研究。数年来,我已经拜读了增渊氏的《汉代民间秩序的结构及其任侠习俗》、《汉代国家秩序与官僚》、《汉代的巫与侠》、《墨侠》等诸论文,感受到其与所谓东洋史学者不同的、清新的研究方法。至少没有板野(长八)氏那种“不熟悉感”,也没有贝塚(茂树)过分周详而产生的“乏味感”。我感觉到增渊的研究在我身上引发了某种共鸣,于是,我尽我所能去了解增渊氏所提出的论点。在上述的《历史学的成果与课题VI》中,就增渊氏的研究做了整理和评说,归纳为如下三点:

一、与其说增渊氏关心的中心在历史学(historisch),毋宁说在社会学(soziologisch)。或者进一步说,其要对古代中国伦理的闭塞性展开实证研究的目标,是有问题的。

二、任侠的习俗,有把人从昔日的宗族性纽带向健全朴素的生活情感解放出来的一面,同时,不也有可能将被解放了的人,再次束缚在新的人际关系的一面吗。增渊氏只强调了前者,而结合后者进行统一性把握,亦是很有必要的。

^① 出自《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左传〉研究笔记》之序说“二、增渊龙夫氏与我”。

三、所谓道德思想,是根植于具体的、固有的社会基础的习俗,作为思想有其抽象化和普遍化的一面,这样的思考是重要的。增渊氏在《墨侠》一文中提到的、将墨子思想中任侠性的一面(兼爱)与专制性的一面(尚同),在此视角下作统一性把握的尝试,是极其卓越的思想分析方法。

上述整理和评说,有本人对增渊氏所关注的问题点、以及其研究方法上的理解不够成熟之处,因此误解的地方不少,也由于自己中国古代史的先入为主而造成。增渊氏的论文集《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于1960年集合出版之际,我以书评的形式进行了自我批判(《社会经济史学》27-3,1961年)。从投稿《历史学的成果与课题VI》的1955年,到对增渊氏的著书进行书评的1961年,其间的五、六年,是我对增渊氏研究的认识渐渐发生变化的时期,也是上述言及在《左传》轮读会上与包括增渊氏在内的诸位前辈一起举行读书会的时期。我写道:“我受到我国研究动向的影响,被《左传》激发起来的研究热情,令我开始思考中国古代史在历史大潮中的地位”,而我的《左传》研究无论怎么说也是在轮读会的成员——特别是增渊氏的影响下进行的。

在此五、六年间,我对于增渊氏研究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也正与我的《左传》研究立场具有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的书评中,对于先前的三个疑问,有了如下的补充和反省。

一、增渊氏关心的中心不在历史学,毋宁说在社会学。更进一步具体地说,他对中国(或者古代中国)伦理的闭塞性展开实证研究的动机,这一问题。

对此,增渊氏在《汉代民间秩序的结构及其任侠习俗》一文的各处,力说社会学考察的重要性,增渊氏自己表述说:

“当时的民间秩序,不是超越家家户户的界限、对于各家都一样有限制的、客观的、非人格性的秩序,在这层意义上,也不是西欧人所感觉的那种地方自治的性质,假如有被命名为秩序的东西的话,可理解为:这是以具体的人或具体的家族结合为中心的、也是通过将具体的人际关系扩展到其外延而维持的、有极个别的、具体的东西。”(《新版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第108页)

关于这一性质的规定,与欧洲近代的 sachlich(本质性)秩序相对比,可以感受到增渊氏认为中国社会更具有 persönlich(个别性),并致力于展开实证性研究。增渊说,司马迁仅注意到游侠的个人伦理而作《游侠列传》。在汉代没有超越具体的人与人结合的秩序,没有那种抽象的、客观性的世界规范和秩序,我的这种印象越来越深刻。那时,在我的头脑中将“历史性”一词,当作通常的“发展性”的概念使用,而增渊氏看待中国社会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静态的观察,增渊氏所使用的 soziologisch(社会学)一词,却被我逆用。

我要指出的是,关于这一点,有两个意思仍算表达恰当。第一,增渊氏理论性的出发点,至少有一项明显来源于马克斯·韦伯。不是将“支配”视作仅仅来自于外部的强加,而结合考虑到被支配的一方有 Legitimäts glauben(对正统的信赖)的一面,这正是马克斯·韦伯考察的视角。增渊氏不满足于将中国古代社会以单一性的父家长制奴隶制概念加以定性,并以此为动机,提出了从内面给予支持的任侠性习俗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基本无误。在《汉代国家秩序的结构与官僚》一文中,氏论及汉代的官僚,通过实证性研究后提出,完备的官僚制度的运行实际上是以 persönlich(个别性)的人际结合关系为基础的。制度与其现实,绝非例外的结合,也不是相互矛盾的事物,事实上,家产官僚制作为汉代官僚制度内在实质现象的揭示,正雄辩地阐释了这一论点。

另一个认为还算恰当的意见是,对于我的“与其说在历史学,毋宁说在社会学”评论,不用说得到现在的增渊氏自己的容忍。不过,这并不是说增渊氏将自己的立场从社会学改为历史学,事实是增渊氏对于我的批判提出了反论,“那么,你所谓的历史,又是什么呢”。在我撰写《历史学的成果与课题Ⅵ》的时候,正非常单纯地认为,秦汉帝国的成立带来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划时代的变化。可以说我正在不知不觉地受到历史学研究会大会主题“国家权力的诸阶段”的影响,只不过将这种看法置换为历史这一用语而已。所以增渊氏从先秦的士开始探讨,一直到汉代的官僚、后汉末的民间宗教,似乎一以贯之地以习俗作为问题,这样的视角当然看起来颇有些暧昧,于是被赋之以社会学的评说了。但是,当我再次集中精力重读《汉代民

间秩序的结构及其任侠习俗》论文的时候,终于明白增渊氏自身的意图正是大胆地将重点放置在社会学上面。而且,之所以用“大胆”表示,是因为增渊氏认为那些自称用历史学分析的研究方法太过粗漏,不可容忍。而我的“与其说在历史学,毋宁说在社会学”的批判,恰好符合增渊氏的意图。

上文所述,增渊氏在很多场合以间接的方式提到过,本书(译者注——小仓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的序论也属于其延长线的部分。然而对于我来说,这里所言及的问题构想,在其处女作《汉代民间秩序的结构及其任侠习俗》执笔的当初还没有这种问题认识。可以想象,毋宁说在用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中国古代家产官僚制的过程中,使他渐渐形成了具有世界史意义的评价。增渊氏继承了马克思手稿的侯外庐的亚细亚古代社会论研究,这一点非常明显。不过,在增渊氏看来,理论终究要通过实证研究加以修正,他并不急于取得单一的理论。不论是魏特夫社会停滞论那样的类型性把握,还是历史唯物论的单一性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它们都是以欧洲为基准来探讨中国的缺如形态,这种研究视角的缺陷,氏不仅在其序论中,还在其他场合都加以强调。毋宁说增渊氏以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因素作为其研究的主体,在以后倾注了研究的主要精力。而这一研究方向,也正是现在的我所认同的,我期待着像增渊氏那样优秀的前辈们,在未开拓的领域里早日树立起里程碑。

二、任侠的习俗,有把人从古老的宗族性纽带向健全朴素的生活情感解放出来的一面,同时,不是也有可能将被解放了的人又束缚在新的人际关系的一面吗。增渊氏只强调了前者,而对于后者进行统一性的把握,不是亦同样有必要吗。

这是基于我未成熟的理解而提出的浅薄的意见。事实上,当我再次拜读《汉代民间秩序的结构及其任侠习俗》后,发现增渊氏只不过把这种习俗作为由内面支持外在的父家长制支配的一种风气来论述,易言之,增渊氏自己从未说过,以新的任侠式的秩序全面替代了旧有的宗族性秩序,等等。而作为相关意思的说法是,实力派世族在面临内外危机、且仅仅依赖旧日的血缘关系,无法对应的时候,将自己周围有能力的非血缘者集中起来,而使这种新体制成为可能的主体性的条件是什么、情义性的条件是什么

么,这是增渊氏所言及的话题。此处的问题至多是关于“支配”的问题。只不过在那样的场合下,特别是像刘邦集团那样既无血缘关系、又无经济上强有力背景的团体,到后来进入汉帝国后所形成的势力,占有十分重要的比重,而任侠习俗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点印象深刻。

这种印象并非我一人所有,增渊氏在围绕刘邦集团以及其后的多次讨论中,也屡屡言明这种特点,而且这种情况根深蒂固并持续存在。增渊氏在其论文《关于战国秦汉时代的集团之〈约〉》中指出,如果没有集团内部具体的、个人性的情义结合,那么来自外部的“约”的强制力,要对集团加以约束,根本没有实效,这一点被增渊氏予以证明。而这一研究的重点,正好相反,所谓任侠习俗不是抽象的时间、空间的一种存在,他强调在中国古代固有的君臣关系形成的场域下,任侠习俗开始发挥作用。关于这一点,考虑一下作为增渊氏所设立的“支配”的背景理论,便越来越明显了。

不过,在以前的论文中,增渊氏说以任侠性习俗为基础的结合,是从昔日宗族性的纽带下解放出来的人们以“健全朴素”的感情为基础,他的描述对任侠风气进行了美化,尤其重视被解放了的一面。针对我的这种指摘,氏在其新著中将上述词语改为“率直”的生活情感。不过我自忖,我对增渊氏的疑问,不过是未能充分理解的枝叶末节的问题罢了。

三、《墨侠》一文展示了一种极其卓越精湛的思想分析方法,我有同感。即,所谓道德思想,是根植于具体固有的社会基础的习俗,同时作为思想又有对习俗加以抽象化和普遍化的一面。在此视角下,将墨子思想中任侠性的一面(兼爱)与专制性的一面,作统一性把握的增渊氏的尝试性研究,是极其优秀的思想分析方法。

关于这一点,正如所言。现在的我仍然认为氏的方法非常正确,这一研究方法诞生了卓越的成果,这就是以《战国官僚制的性格》等为中心展开的一系列法家、儒家的分析。法家作为“术”的德,与儒家“德治”的德,事实上两者都是春秋末到战国,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的恩惠授受关系,它们不都是建立在共同的情义性结合的基础之上的吗。将重点只放在支撑那种行为的内面的心性上,并且在道德思想的层面赋予价值,这就是儒家的德(仁义)。而另一方面,丢离心性的一面,专以利益诱人的“术”,并从观

念上予以合理化,就是法家的德(庆赏)。增渊氏的这种思考方式,极富启发性。我从这样的着眼点中得到了极大的刺激与启发。此处特记为念。

不过,关于这一点我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上文言及作为《历史学的成果与课题Ⅵ》的续文,在谈到氏所研究《墨侠》思想的精彩点之后,接着我写到:

“不过,仍然留有疑问之处。关于墨子的思想,增渊氏从任侠习俗展开了精彩的分析,但是其他的思想又怎样呢。还未接触到增渊氏关于其他诸家思想的论稿,颇为遗憾。允许我做一個失礼的推测:我们也许已经无法再期待其对于其他诸家思想的研究能够超越《墨侠》一篇所给予我的快感了吧。氏所研究的任侠习俗论,正是出自墨子,或者说仅限于墨子也不为过吧。”

在稍稍涉及私事之后,我的这篇文章刊载于《年报》。文章发表以后,在一个车站巧遇增渊氏。他把我拉入附近的一个咖啡馆,非常自信地说:“务必看一看马上发表在《社会经济史学》上的论文。”这是我与增渊氏个人之间的首次接触。当时所说的就是《战国官僚制的性格》一文。确实在那篇论文中,既涉及到了任侠的习俗,也有上文所及对法家、儒家精湛的分析。一如所见,我的误识建立在我对于《墨侠》论文仅仅了解关于任侠习俗的部分。事实上那篇文章所指出的问题,仍然是中国古代固有的“支配”的性格问题。而我对这一点的不明,万分羞愧。

正如上文所示,围绕中国古代历史,我对增渊氏的倾倒与日俱增。阅读论文,一旦产生疑问,我便找来增渊氏的其他论文,边阅读边思考,发现大部分是由我自身的误解所引起。在我冥思苦索某个问题的时候,在那前方的几十步处,增渊氏已然在独步而行。正如书评中所写,我真正感觉到了“杰出前辈”的存在。这在对于很多的研究者抱有无法融合、无法紧随其后只有敬而远之、任性不羁的我来说,增渊氏是少有的倾倒崇拜的对象。

小仓芳彦